

陈彦的《主角》斩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是陕西文坛又一成绩，《装台》口碑在前，《主角》折桂在后，其厚重的现实主义旨归和历史意识与陈忠实、路遥等文学前辈一脉相承，笔者在此无意赘述它的主题意义和文化价值，只想谈谈忆秦娥这个人物塑造本身的优良与不足。

陈彦很擅长写小人物，《装台》是关于秦腔幕后装台人的百态人生，《主角》亦是写一个放羊娃成长为秦腔皇后四十年的的人生历程，囊括了她由乡到城，由无名到红火再到落幕的曲艺人生。这样说来，它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以忆秦娥成长史为内在结构的小说：从易招弟、易青娥再到忆秦娥的命名转换，她随之完成了身份转换，并最终被确立为秦腔界的美学符号，但作者的追求远不止于此，作者自陈：“《主角》当时的写作是有一点野心的，就是想把演艺与围绕着演艺而生长出来的世俗生活，以及所牵动的社会神经，来一个混沌的裹挟与牵引。”[陈彦：《主角·下》，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893-894页。主角忆秦娥的成长遭际被作者放置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舞台上去看，相应地，彼时之世俗观念、个体的性别认知、承袭的传统文化在塑造着她的个性，她是一个在具体可感的社会环境中被资源撬起来的鲜活个体，带有鲜明的历史印记。换句话说，她身上有她所经历时代的一切痕迹。此外，她和她身后的秦腔配角们又用自己对于艺术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影响和改变了西安城的气息和文化。因此这部小说就具有了人物与时代互动的有机关系。

一

身份认知是首先笼罩在忆秦娥身上的一重阴影，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她来自乡村，对于县城生活的复杂和丰富感到迷茫与惶惑，行为则会不由自主地趋于内向与保守。她对于城内的生活非常抵触，尤其是文革末期的政治批斗和审判密度让她感到万分惊惶，剧团内的相互倾轧和争斗则让她回忆起乡村生活的简单朴拙，从心底对于乡村文化的朴拙和乡土气息的淳朴感到无比怀念。二是舅舅胡三元的种种行为带来的，在剧团内舅舅俩互相依靠，所以党“白专”，阶级斗争新动向、刑事犯等等等级左年代的身份标签紧紧烙在舅舅的身上同时，也必然给忆秦娥一种连带的耻辱感和不安全感。

忆秦娥是被舅舅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村带出来的，身穿姐姐的新褂子，连脚上的旧力鞋也是从邻居家借来。正处于发育时期的她完全不知何为唱戏，拿不准音，对剧团生活感到惶恐，她最常发生的感受就是自己“不配”和“不敢”进城唱戏。刚刚拜师学艺，舅舅就被恶意指上了“白专”之名，遭到激烈批判和打压。舅舅虽在剧团中本就是人见人嫌，怨结不少，这样一来，忆秦娥受到的白眼和讽刺更不会少，她日益忧心吊胆。紧接着舅舅由于在举国悼念毛主席的时候躲在房中暗自练习敲鼓，又被政治挂帅的剧团革委会主任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押往公安局受审。其实舅舅胡三元业务能干，鼓艺一流，秉性刚正耿直，在样板戏一统剧团的时候能够直言不讳，对剧团敷衍走样的排练大加批评，为此多触众怒。此次大团针对他开展的批判活动更令剧团众人有了发泄口。相应地，忆秦娥难免不敢被弃到完全被剧团成员边缘化，但是“她也不敢喊，因为她心里觉得，自己是不配喊叫的。一喊叫，也只能招来更多的白眼。”[陈彦：《主角·上》，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当剧团失窃，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了她，认为这个白专分子的外甥女大有嫌疑，这种处境和遭遇进一步令她渴望逃脱剧团，回归家乡

摘要:李洱与《应物兄》在一片热议中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从构思到面世，历时十三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呈现出一种回归传统又锐意创新的复杂面貌。小说直面现实，真实描写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图景与精神危机，深刻反思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小说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杂糅表象下，暗藏着反讽与消解的本质。这种特征使得小说在描写现实生活 的广度、透视当今社会的深度两者之间达到了某种平衡。

关键词:李洱 《应物兄》 杂糅 反讽 消解

睽违十三年之久的李洱，在2018年交出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应物兄》。一经推出,《应物兄》即刻成为文学界的焦点作品,在该年度多项重要的文学评奖中《应物兄》都有所斩获。作为先锋文学之后重要的代表性作家,早在2003年,李洱的《花腔》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10月,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李洱《应物兄》赫然在列。在批评家热议声中得到中国文坛长篇小說最高奖,《应物兄》似乎重返现实主义但又难让人指出其现代主义锋芒,进入日常生活写实姿态与先锋多元的艺术创新并举;摹仿三代知识分子群像,直观当代知识分子生存境况与精神危机;试图使当下与传统对话,承接与激活传统,又无不警惕地审视、反思当代社会。在人物、文体、学科、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杂糅和形形色色谄媚的表象之下潜藏着对人物、事件、意义的反讽与消解,凸显了李洱对知识分子与当今时代的批判与忧思。

一、杂糅

小说以济济大学邀请国际儒学大师程济世还乡任教、筹办儒学研究院为主线,以学术骨干、“学术明星”应物兄为主要人物,刻画了以济州为主干的官场、学界、商界、宗教界各色人物近百位,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儒学家、儒学爱好者等身份在多人物身上耦合;叙事层面,正叙、插叙、补叙、预叙等叙事方式杂糅,另外叙事视角也存在第三人称、第二人称、第一人称的交织;小说文本游走在“记事”与“记言”之间,李洱无法割舍的知识性趣味,在卷帙浩繁的经史子集间自由采撷,大量文学、考古、宗教、历史、哲学、生物学、建筑学、风水学的知识融入于小说文本,规范化的学术论述、寻章摘句式的思辨与交流夹杂其间。

1. 复杂生活的反映

80余万字的篇幅里,作者试图勾勒一副宏阔大的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群像,清晰到稍显简单的主干故事省腾出大量空间去旁逸斜出,延伸枝蔓。据统计,《应物兄》共写了七十多个人物,随着由主人公应物兄勾连起来的人物关系网络的铺展,与程济世商洽回国任教事宜、儒学研究院的建设,济济各路人士纷至登场;素有威望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如程济世、乔木、姚鼐、何为、双林、张子房、麦养、兰大师等,政府领导如栾庭玉、梁招尘、邓林、侯为贵、董松龄、杨双长等,商人如李季慈、铁枝子、黄兴、雷山巴等,应物兄身边的知识分子朋友如华学明、汪居常、敬修己、文德斯、郑树森、袁娘、陆空谷等,应物兄的师弟费鸣和他的弟子张明亮、易艺妮等,具有外国身份或背景的人物如卡尔文、珍妮等,此外还有和尚、电台主持人等等。学术象牙塔的纯粹无暇是否已经沦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噩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物兄没有自知伏案桌前,反而周旋于这各色人等。不少人物都打着自己的算盘接近儒学,推进儒学研究院的筹办,出版商李季慈为了销量,将应物兄原先起草的书名《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改为更有噱头的《孔子是条“丧家犬”》,安排他去

逃遁与升华

——评陈彦小说《主角》

■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陆王光华

那种简单的放羊娃生活。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舅舅胡三元改造结束，回到剧团后影为临时工，做一些帮厨和装台的工作，接到《洪湖赤卫队》的道具制作任务后，一心出风头、扫晦气，自作主张加大了火药剂量，酿成了炸死演员的大事故。这次事故的根源，必须追溯到文革时期艺术界政治挂帅的语境，当然与胡三元本身的猖狂性格也有关，然而他本人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劳改时不忘敲鼓，到了监狱依然坚持敲鼓，在监狱还能组织文艺活动，颇有几分“受活”的意思，可见其性格坚韧，正似秦腔精魂。外甥女忆秦娥的青春时代却为此蒙上了被鄙薄排斥和欺压折磨的阴影，当学员们听到舅舅被抓走后，立马有人用她的脸盆接夜尿，以示划清界限，政治正确。当舅舅被当众宣判坐牢后，她顺势被当作走白丁的样本发配到厨房，更受到了剧团人员的冷嘲热讽，回家放羊更好的念头再次在心头燃起，几次夜逃，后来被老师胡彩香留下。这时候她意识到，生存是压倒她的那根稻草，留在城内，已然成为这个农家女孩的唯一选择。没有条件，便闷着头在灶房里找机会练习劈叉下腰，继续拜师学艺苦练，以图抵御烧火做饭带来的空虚和寂寞，灶房被她视为自己的独立空间，在此她不需要面对嘲讽和羞辱，可以获得短暂的安宁。

更重要的是，此时文革结束，旧戏重现天日，原本蛰伏在剧团内的几位老秦腔艺人活跃了起来，其中一位偶然见识到了忆秦娥的基本功和耐性，决定收她为徒，并且认为忆秦娥是一块唱戏的好材料，并且打赌说，如果忆秦娥唱不出名堂，自己就要绳上吊，对于一个边缘化的人来说，这种赏识和抬爱实在如雪中送炭。虽然这时她还处在未开蒙的学戏阶段，学戏和排练《打渔杀家》在什么实现高瞻远瞩的人生价值，只因为那比烧火做饭来得更美、更有充实感，也能给看重自己的人一个交代。实际情况是更苦、更累，正是凭借着这种好苦学苦练的劲头，她开苦了自己的戏曲生涯，初学秦腔唱腔，初练初排折子戏，就是她以静默遵守的方式突破他人性格的开始。身份投下的阴影，同时也为她带来了光明。被边缘化的处境和被欺压的人生带来，令她能够不受剧团内僵化死板的样板戏训练的摧折，而她本身无奈退居而又安守一隅的姿态，也令她沉潜于真正的秦腔唱念做打全套把式，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祸兮福兮。

二

“性格是一种流动物，人物的性格绝不会在情节中保持固定。”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第3期。而是随着时间推移，空间演变，随之流动，性格必然显示出变化。“任何个人，也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如此，性格必然如“泻水置平地”一般，显示出多维度的发展。尤其是担纲主角，意味着非常态，无消停，难苟活，不安心。如果说因为舅舅带来的影响，已经让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感到不堪重负，新师父苟存忠的信任和赏识

论一种杂糅表象下的反讽与消解

——评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

■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吕嘉成

各地参加活动，趁热推出关于儒学书籍的选题策划；济大校长葛道宏极力试图促成程济世的归国任教，也是看中了他国际儒学大师的身份；栾庭玉等官员帮程济世和儒学研究院规划为政治资本，还试图说服黄兴以“招商引资”；铁枝子、陈董等商人直接进入儒学研究院的规划与建设，雷山巴热衷支持济哥的“重生”研究正是因为此中巨大的经济利益，黄兴遵师命投资儒学研究院，也不忘为自己的生意“排兵布阵”；更不用说那些一个个打算进入儒学研究院的学人或领导亲自安排的亲戚，“哦，转眼之间，太和研究院又进来一个人”李洱：《应物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655页。1。

学术难以纯粹，校园也不再平静。大儒程济世和他宣扬的儒学成了各色人等眼中有利可图的祭旗，儒学研究所也变为牵扯到济济各方的一项投资计划，项目工程、政治资本。《应物兄》充满不同人物的“众声喧哗”，以写实的笔触描摹了当今知识分子复杂的生存空间和学术研究的处境，一定程度上它是当今社会与时代的一个镜像。其中多种身份在一个人物上耦合，也展示了人性的复杂维度，如乔木融合了知识分子、导师和父亲、岳父多重身份，他一方面是一个典型的知名教授，一方面又是苦于应付女儿的父亲；既以导师身份教育应物兄又以岳父的身份调和应物兄与她女儿乔珊瑚的矛盾；一个博学、圆滑、老辣、慈爱的老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由于《应物兄》整体上着眼于描写和刻画人物“言行”，“论迹”，情节也趋于平缓，主线之外枝蔓蜿蜒，多数人物穿插叙述，致使除主要人物外读者对许多人物记忆不清。正如有论者指出小说用力过于平均、分散，造成许多人物形象的塑造面目模糊，性格漫漶，篇幅增加反而冲淡了主要人物的刻画，次要人物也面目模糊。[参阅刘江滨《应物兄·求疵》一文，《文学自由谈》2019年02期，第38-44页。如何利用长篇小说的篇幅展示复杂世界，如何安排人物的主次，如何合理剪裁，都是始终困扰小说家们的问题。

2.叙事方式与叙事视角

《应物兄》的主线不能数月耳。李洱调度正叙、补叙、预叙、插叙等多种叙事方式，在推进主线情节的过程中，往往穿插人物的回忆、过往的交谈等等，使得主线故事旁逸斜出，任意恣肆。试以小说开篇几节为例，故事主线是应物兄奉命筹备儒学研究院，第一节“应物兄”，在应物兄洗澡中补叙了葛道宏让应物兄劝学费鸣加入儒学研究院，从第二节“许多年来”开始离开主线写了应物兄与导师兼岳父乔木的过往、乔木的爱犬木瓜，第四节又回到故事中的现场——宠物医院，随后五节又旁逸斜出叙述了应物与费鸣的恩怨，应物参加电台节目、季宗慈的过去、姚鼐与乔木的项目等等，兜兜转转第十节又回归宠物医院，其中用墨不等地牵扯、点染了众多人物。《应物兄》整体便是这样一种“状态”：主流缓慢磨腐，支流繁芜奔腾不息。《应物兄》似乎是一团块茎，模糊了中心和边缘，组合着过去与现在，拼贴不同学科的横断面。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冒险而试学的写法，一方面游离于主线外的叙述增加了文本的容量，

逃遁与升华

好不容易令她重获信心、安心琢磨戏艺，那么猥亵事件则令她重新坠入黑暗，其性格由原本的痴憨又添了几分执拗和内向，这是她性格变化的第二个阶段。有读者指出，忆秦娥的别扭性格和不懂事故显得近妖似伪，恰恰相反，忆秦娥的性格是一步步被外界环境和内在心理塑造而成的。因为来自贫寒的农家，面对县剧团的众人尤其是干部子弟时她是谨小慎微甚至是胆怯的，虽从不惹或是生非，可好事者从未停止过对她的嘲弄，而舅舅多番犯众怒、犯错误，她被剧团边缘化，更加战战兢兢。她所能做的只有暗自练习，一个烧火女娃的练习显得前途渺茫，尽管如此，她还在兀自练着、练着。自从进伙房烧火做饭以后，她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完全是由于缺乏依靠，缺乏情感支持造成的，她用戒备和忍耐封闭了自己所有的通路：“一切都是需要自己去慢慢忍耐消化的。痛苦告诉别人，只能延长痛苦，增添痛苦，而对痛苦的减少，是毫无益用的。这些年，她把这一切看得太清楚了。”入剧团不过几年，她的心态宛如一个历经风霜的中年人，这足见她咀嚼苦难、理性克制的心性。可此时却发生了猥亵事件：厨师廖耀辉在一个夜晚试图猥亵她，此事并没有成行，可刑满归来的舅舅暴躁如雷，令原本平静的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渐渐被扩大化，后来的数次受伤，均是因为这件事被剧团内好事之人添油加醋变成了污名忆秦娥的最有力“武器”。每每在她的事业迎来新成就的时候，都有妒恨之人将此事翻出来，对她的人品大加羞辱。

有这样险些遭受无耻之徒猥亵的经历，又数次无意撞见亲近之人舅舅和师父胡彩香的事，因而她对于性与爱发自内心地感到恶心和厌恶。这个时候的忆秦娥，虽然在秦腔演艺技巧上日臻炉火纯青，却堕入了生活的圈套：她失去了爱的能力，也被新患上了性恐惧。“自打那年在刑场，经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后，她就觉得男女命运，一切似乎都是不洁的。”[陈彦：《主角·上》，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页。面对追求者，她压抑和逃避，被动地等待，以致错失佳缘。直到步入第一次婚姻，她对于性和爱的恐惧和憎恶感依然有增无减，甚至假意敷衍，“在她内心深处，对性，总在一种干净与不干净中徘徊。跟丈夫刘红兵在一起，她就是个尽量哄着、躲着、回避着。”[陈彦：《主角·下》，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784页。不仅如此，她对于两任丈夫的态度充满了冷淡和隔膜，性格刚烈如火，如刀如剑，时而暴躁如雷，甚至是对丈夫拳脚相加，上演“全武行”，一改人前羞涩、木讷、安静的样子。忆秦娥的性恐惧和性逃避，看似是对多个具体事件的本能反应，其实来自沉凝滞的集体无意识传统的影响，也植根于具体的文革时代。尽管建国后的中国已在逐步完善关于男女平等的各项法律法规，也以“妇女能顶半边天”提升妇女地位，并且逐步引导女性自身建立正确的性别认知，但是十年动乱里，思想进入极端“共名”状态，原本正在步入健康的社会语境成了一片废墟。枪炮流氓正给秦娥造成的阴影，是“严打”之偏离司法公正带来的，而窥见舅舅与胡彩香的几次性事和厨师对她的

企图侵犯，则完全是特殊时代的性压抑和性禁忌衍发的恶果。更为重要的是，忆秦娥自身持守的是极其传统的中国两性思维观念：首先，性是不洁的、羞耻的，而且会给人带来犯罪感，男女大防万万不可破；其次，性是私密的，那么亲眼见到两位亲近之人的性场面则令她如遭五雷轰顶；最后，被污蔑为失贞更是令她崩溃，失贞的谣言引发了她对于自证贞节的渴望，她无法面对这样的道德指责，这才会有她用医院的化验证明来为自己贞洁“加冕”的情节。因而，作者借忆秦娥的遭际，实施了对于传统桎梏和社会世俗压抑和迫害女性的深切批判。

尽管如此，在对待恶意的加害和诋毁时，她却宛如一个坚忍的圣人。有好事者编造出忆秦娥的数十条罪状，在城内和网络散播，称她有二三十个“情夫”，私生活混乱，且毫无艺德，用秦腔界的“蛀虫”“戏霸”“怪胎”来抹黑她。可是真到了公安局介入，将要水落石出的时候，忆秦娥却说：“一切都让它就这样过去吧！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任何害我的人，我也不想知道。我也不愿意看到，他们经受比我心灵还伤残的惩罚。我需要安静。”[陈彦：《主角·下》，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859-860页。她的宽容和谅解完全是人性善意的极端状态，但参见上文她对于丈夫的态度，读者不会认为她是一种类型化的“圣母”。刘再复世界在论述人物性格塑造时指出：“人的性格世界不可能仅仅是某种单一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正如社会是充满矛盾的，人的性格也是充满矛盾的。”[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第3期。主角忆秦娥就是这样充满矛盾的状态，在人性天平上，她显示出性格的平衡状态：温柔又暴虐，灵巧又木讷，勇敢又保守，真诚又暗藏心术，沉静又疯狂。忆秦娥的性格中有这样多相抵牾的因子，但那不过是构成人物弧光的成分。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成也命运，败亦命运。她性格中的负面因子可能是她不幸感情、婚姻和家庭根源，但她性格中的正面价值则为她戏曲成就添砖加瓦。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来看，其实忆秦娥“情感与爱的需要”是完全没有得到满足的，在之前前提下，有限的精力便放到了排练唱戏上面，为获取“价值实现的需要”而付出心力。换句话说，在曲艺上的成就也许正是因为她贬抑和忽视自己人生活才得以取得的，这正是忆秦娥既值得称颂与尊重，又值得同情和理解的地方。

三

《主角》表层的主题是一个农家女孩破除万难迎来曲艺成就；中南海献艺，接着海外发声，成为蜚声中外的秦腔金皇后。但是在这种旗帜鲜明的主题之下，还有着对于一个普通女性命运的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忆秦娥看似拥有盛名，花团锦簇，但到了剧团培养新人的时刻，又寂然落籍。合上书，读者此时又不会套用世俗准则来评判忆秦娥的一生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但作者显然不愿意使忆秦娥成为一部奋斗小说的主人公，否则应该会为她设置一个圆满的结局，事实是在小说的尾声，忆秦娥站在西安古城墙上，以凄婉的唱词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主角是

生命长河一孤岛，主角是舞台生涯一浮漂，主角是一路斜坡走陡峭，主角是一生甘苦难言喙，占尽了风头听尽了好，捧够了鲜花也触尽礁。”

在陈彦眼中，忆秦娥就是秦腔的化身，秦腔被称为百戏之祖，唱遍西北五省，以原始、粗犷、豪迈、萧瑟著称，因为这是来自民间的真实生命呐喊，主角忆秦娥，与秦腔一样，始终在以她血肉之躯，承继和发扬这门艺术最接近本真的衣钵，嘶吼和吟唱着自己的苦与笑，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如此，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亦是如此。因而她的恒心、毅力、担当，以及澄明的心志和对待秦腔艺术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就是这个人物最显要的美学意义。每一次的危机，她都几乎以练功来静心，只有在舞台上，在刀房里，把一切时间都消磨完了，她才觉得一天的事是干完了。“练功对于她，似乎跟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需要，而不是工作。”[陈彦：《主角·下》，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481页。]戏曲行业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行业，随着新时期以来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浪潮席卷全国，经济至上主义成为从上到下的显学，那么戏曲行业的萎缩、衰退就显出时代之必然，也正是在这种非常时期，忆秦娥的困境不再是身份的自卑那么简单，也不再只有情感孤独这一重，而是叠置了滴溜而又温情脉脉的金钱诱惑。可是忆秦娥始终没有“转换”思维，也没有在过于精明的社会中学会精明。“如果太精明，也就没有忆秦娥了。因而，陷害、攻讦、阻挠，反倒成为一种动力，而把一个逆来顺受者推向了高峰。”[陈彦：《主角·下》，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896页。1

值得一提的是，忆秦娥并非初入行就体悟到了这种沉浸在练功所带来的安适和满足中，她起初对于唱戏的顺从态度只是顺应舅舅的安排，甚至在于心理不来的时候渴望退居二线，这其中不乏有逃避的心理，是一种顺应，可是渐渐地，她慢慢从生活的磋磨中咀嚼出戏曲的味道来，这是一种突围与升华，其中内生一种从“自在”到“自为”的进阶过程。人作为文化的存在，自在和自为是人的文化存在的两种状态，我国农民仍处于自在生存状态：心理型的农业生产，单调的生活方式、盲从的心理状态、而自为状态是自觉的知识或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陈春燕：《农民从自在到自为的文化超越》，《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忆秦娥浸淫透彻的还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农业文化，她进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一个生存的饭碗，为了糊口，最初练功夫也出于求生之无奈，在她的心底甚至认为：在家放羊比练功要轻松得多。然而她在日复一日的背唱本和背诗词、日复一日的咀嚼磋磨中慢慢凭借着自己的勤勉与良师的指点进入了艺术的殿堂，在吟唱中体会了秦腔百折不挠的精神内核，这使她走进了一种更为开阔的文化中，至此，她得以用艺术直观的方式温补自己的学识缺憾，并最终用领悟和勤奋完成了艺术人生的升华。

忆秦娥的性格塑造是值得称道的，作者将她放置在时代和文化的风云变幻之中，所以这一人物显得饱满而丰富。遗憾的是作者对于她的外貌与神态想象是有缺憾的，在小说中，只要涉及到忆秦娥的外貌，一律被形容成“奥黛丽·赫本”般的面容，而她面对外界的关注时似乎难以回答的问题时，神态往往只是“用手背捂着嘴，瓜笑”或者“兀自盯着脚背，不说话”之类，对于一个性格维度如此多面的人物来说，这种片面化的外貌和神态描写对于她的性格塑造和人格塑造来说难道不是一种伤害吗？

是各路人等“活色生香”的欲望。批判之意寓于谄媚，尤其是对于书中的知识分子而言，谄媚是一种言行与、里与表的断裂：他们似乎高居于知识分子引以为傲的学科与人文精神之中，可在现实利益面前又有一副媚态。

小说最大的反讽与消解首先在于儒学研究院的选址和济哥的“假死”。让程济世魂牵梦萦的“乡依，济州市政学商三界合一、动用了无数物力、人力、财力，以一种掘地三尺的架势去考据程济世儿时的家——仁德路上的程家大宅究竟在哪里。终于他们找到了，同样是一种谄媚之姿、同样不惜一切力量，他们精细无比地“复制”了程济世回忆中的程家大宅；与之并行的，程济世引以为傲的济州蝴蝶——济哥似乎灭绝了，作为一种欢迎程济世归来的贺礼和蕴含巨大商机的产品，华学明等人费尽一切办法终于成功复活了“济哥”。强烈反讽的是，故事的最后，应物兄发现原来一个做贼不起眼的院落才是真正的程家故居，天然“济哥”也压根没有灭绝。巨大错位，是一种反讽，嘲弄了每一个人的谄媚，讽刺了所谓儒学研究院表里不一的虚假性，更是揭露了当今社会对学术的异化；它同时也是—种消解，消解了那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表达了人面对生活的那种永恒的无力感和虚无感，世界和万物是永恒而不可捉摸的深沉诗意。

应物兄和儒学本身也是理解这种反讽与消解本质的关键处。摘取自《晋书·外戚传·王谧》的一句格言“虚己应物，恕而后行”是理解应物兄的钥匙。应物兄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自我是空心的，对内表现出复调性，各种自我不断对话、辩驳、齟齬、整合；对外他又变化随意，在导师、学生、教授、公众人物、老公、朋友等多种身份间来回穿梭，在官场、学术界、商业圈内不断变换，随物赋形。应物兄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个标本，一种破碎的、复调的、不断生成和运动、不统一的自我，是透视知识分子甚至时代的一个切口。有人谈《应物兄》的主旨在于全面传播儒学当代化，弘扬儒学精神，以艺术的形式推动儒学的当代化。[参阅刘江滨《应物兄·求疵》一文，《文学自由谈》2019年02期，第38-44页。笔者认为这似乎是对小说的误解，不得不承认李洱对儒学的态度是暧昧的。他一方面在小说中将儒学定位为一种赢得世界共识、拯救和改造当代社会的良方，可又以一种反讽与消解性的策略刻画儒学和儒学家；每一个读小说的人都可以根据易学品味出各位儒学家的言行不一，他们的行为和儒家所提倡的各种原则是齟齬的，甚至相反；儒学变成一种阐释学游戏的靶标，每个人都可再不断阐释其当代价值、重要性，不断包装儒学，其一时随境迁，各家对儒学的“新解”合理性、合法性何来？其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对这种价值和重要性的消解与讽刺，例如说小说中儒学的“大祭司”程济世于己于他都被塑造成一个救国救民、兼济天下的鸿儒，大儒，可是面对儒学研究院，他反复声称的是自我割舍不掉的儿时回忆，他的归来也成为等待戈多式的荒诞戏剧。种种消解，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也拓宽了解释的空间。儒学到底是什么，对当代的价值何在，成为李洱抛向大众的开放问题。

《应物兄》是这样一本小说——显而易见，它鲜明的特点应该是它的优点，但同时又不能回避的是这种特点也暴露着某些不足与缺憾。它是许多正反对立的混合体，传统与新颖、精致与粗糙、古老与现代、单一与含混、简单与复杂……总之，《应物兄》是值得商榷争议的一部作品，李洱是一位值得等待的“应物兄”。